

中国音乐学院中青年学者文库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成果

# 史论同归

徐天祥音乐研究文集

徐天祥·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音乐学院中青年学者文库  
“双一流”建设高校科研成果

# 史论同归

徐天祥音乐研究文集

徐天祥·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论同归:徐天祥音乐研究文集/徐天祥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21.5

ISBN 978-7-5039-7135-8

I. ①史… II. ①徐… III. ①音乐评论—中国—文集

IV. ①J6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11492号

史论同归——徐天祥音乐研究文集

著 者 徐天祥

丛书统筹 董良敏 刘变梅

责任编辑 董良敏 李 璐

责任校对 董 斌

书籍设计 顾 紫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52号(100700)

网 址 www.caaph.com

电子邮箱 s@caaph.com

电 话 (010)84057666(总编室) 84057667(办公室)

84057696—84057699(发行部)

传 真 (010)84057660(总编室) 84057670(办公室)

84057690(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21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5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39-7135-8

定 价 98.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自序

本书是笔者自2003年以来在各期刊发表的部分学术论文的结集。回忆起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在本科二年级上学期，当时《“梁祝风波”》与《关于立法保护民间音乐的问题》两篇文章分别同期发表于《天籁》与《乐府新声》2003年第4期，这给年少的我以莫大激励。这些文章现在读来尚显稚嫩，却记载了我从青涩学生一路成长的历程。一般而言，乐界前辈大家方出文集，青年后学出文集令人惭愧。适逢中国音乐学院组织出版“中青年学者文库”，笔者也提交了自己的文稿，作为对过往学术生活的纪念。

笔者的研究领域为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史)。文集或从史论结合、或从单一史或论的视角对相关议题做了研究，共分为四编：

第一编为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方向的研究。关于这一研究，笔者按照“田野与文献互证”的要求，一方面踏下心来、离开书斋、走进田野。只有深入下去，才能发现祖国无穷无尽的音乐宝藏，感受到书本知识的现实来源，也才能真正有所发现，在田野中自然地找到学术问题，体悟到“田野出新知”的涵义。此前笔者研究太行山一带的音乐时，曾背着铺盖卷儿、挑着行李，跟着左权、陵川盲人曲艺队的盲弟兄们下乡。而读博时导师让做满一年田野方能开题的要求，一度让我觉得遥不可及，但真正深入下去后又觉得收获颇丰，常有时间不够之感。无论在目瑙纵歌的德宏、崇山峻岭的怒江大峡谷，还是带着传奇色彩的缅甸，不惧艰难险阻、与当地真心交朋友，不仅让研究者有所发现，也增进了美好的人生体验。另一方面全面占有研究文献，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让材料相对客观地呈现出事物本身的样貌，尽可能透彻地解决学术问题。书中对“风搅雪”音乐现象的研究，对中缅景颇—克钦族傅能仁简谱、字母谱的重

新解读等，即是田野与文献互证努力的产物。

第二编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方向的研究。该研究是一个充满魅力，但争论较多、需要更多学术与人格勇气的领域。那时笔者年轻气盛，受文学界“当代文学关键词”及音乐界“重写音乐史”讨论的影响，凭着一腔热血，提出过“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关键词”的研究构想，就学界颇有争议的赵沅“两个怪胎”说，以往被视为“黄色歌曲”，但改革开放以来深受广大民众欢迎的刘雪庵作品《何日君再来》，发表了两篇音乐领域的“关键词”。其行文与观点未必成熟，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评价也可以再做讨论。不过中国近现当代音乐关键词的研究仍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有待于学界同人共同推进。笔者的后期研究经过文献学的学习，更加注重文献史实的发掘。如被学界归为萧友梅成果的《复兴国乐我见》一文，笔者认为既非萧友梅主要撰写，也不能代表代笔者陈洪的学术思想，而是延续了陈洪的一贯主张，亦渗透了萧友梅的不同观点。今人论述萧友梅、陈洪音乐思想时若引用此文，应十分慎重，以使得每段、每句的文字与二人思想有着准确对应。

第三编为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交叉性质的研究。按照学界惯例，中国传统音乐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关注对象、研究方法、学者群体等均不相同，但实际上中国传统音乐在近现代同样发生着演变。无论将之划入音乐史还是传统音乐领域，中国近现代传统音乐史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笔者甚至认为，近代是中国传统音乐颇为辉煌的一个时期，与其他时期相比并不逊色。以往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实在太少，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传统音乐的比例与客观现实不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也较少开展纵向的中国传统音乐史的梳理。笔者对此进行了一定探索，希望弥合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史）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论）之间的分隔，从此探索中国近现代传统音乐史的研究（同归）。

书中围绕中国近现代民歌所做的系列个案，即是笔者在这一领域的尝试：如对近代史上“东蒙民歌采集活动”的研究，钩沉了安波、许直、胡尔查等人搜集整理《嘎达梅林》《牧歌》《诺恩吉娅》等东蒙民歌的史事，发现著名歌曲《敖包相会》的歌词动机源于东蒙民歌，其中介环节即是1948—1949年的内蒙古歌剧《十五的月亮》；《敖包相会》的曲调原型更接近东蒙民歌《韩秀苓》。《〈鄂伦春小

唱》来源考》阐述作为鄂伦春族民族身份象征的《鄂伦春小唱》，很可能源于蒙古族浩德格沁民歌，该曲的产生与流变深刻地体现出音乐在不同族群间流动、变迁与文化再造的现象。与孙兆润兄合作的《〈在银色的月光下〉来源考》，探明我国“西部民歌”《在银色的月光下》既非塔塔尔族民歌，也不是俄罗斯作曲家达尔戈梅斯基的作品，而是在俄罗斯广泛流传的同宗民歌《在银色的河流上》，完成了先贤音乐家王洛宾、黎英海探访此曲来源的生前心愿。交叉研究也使本书关注到传统音乐的文献版本问题，笔者搜集了吕骥经典文献《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的20余个版本，将之总结为“简本/全本”两大版本系统、七个主要版本，认为学界目前通行的“汉族民歌体裁三分法”（劳动号子、山歌、小调）出自吕骥1942年的“简本”，吕骥的传统音乐分类法呈现出动态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

第四编为上述两个领域的乐人乐评研究。蔡仲德、李西安、居其宏、樊祖荫等先生是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家，他们的著述给予少年、青年时期的我以精神力量，书中的人物评传、书评等即反映了前辈学者对笔者的影响。集中对相关音乐事项的记述探讨，都是笔者关注历史与现实、从史或论两个角度审视中国音乐文化的学习过程，凝结着著者对于祖国音乐文化的殷切之情。

面对书稿，我要感谢母校中国音乐学院领导和老师的培养；感谢博士阶段导师赵塔里木教授和硕士、本科阶段导师陈铭道教授两位恩师对笔者多年的教诲，他们的辛勤培养与鞭策使我多年来潜心治学，不敢懈怠。感谢戴鹏海、乔建中、王小盾、姚艺君、高佳佳、马彪、杜永宏等先生，给予我求学路上的关爱与无私帮助。感谢首次刊载论文的各期刊编辑部，尤其是郭树群、陈荃有、赵志扬等先生，笔者在学生时期赶上了音乐期刊“为新人立言，为新论铺路”，以及“全国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活动”等培养后学的举措，拙文因此得以陆续刊发。如果说本集的论文未必做到“妙手著文章”的话，他们却实实在在地“铁肩担道义”。正是他们一心为学、“甘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奉献，才成就了学术的繁荣，也引导我自觉地走向音乐学之路。最后也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温暖的爱支持着我的学业，伴我度过遥远田野中的日日夜夜，在孤寂而快乐中进行冷板凳上的研究。

徐天祥

2021年1月1日

目

录

## 第一编 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多元并存 交叉融合

——重审“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关系 \ 3

“风搅雪”音乐现象研究 \ 31

傅能仁简谱研究 \ 61

中缅景颇—克钦字母谱研究 \ 90

中缅“报佳音”音乐活动考察 \ 113

关于立法保护民间音乐遗产的问题

——从“西部民歌风波”到“乌苏里船歌之争” \ 128

音乐研究中音乐民族志的价值 \ 143

## 第二编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

“两个怪胎”

——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关键词系列之一 \ 157

《何日君再来》

——当代（近现代）中国音乐关键词系列之二 \ 169

关于《复兴国乐我见》的作者问题 \ 187

“梁祝风波” \ 203

走向世纪交汇的当代中国音乐批评与理论争鸣 \ 211

### 第三编 史论交叉研究

“东蒙民歌采集活动”研究 \ 231

1948—1949年内蒙古歌剧《十五的月亮》探析

——兼论歌曲《敖包相会》的来源 \ 252

《鄂伦春小唱》来源考 \ 277

《在银色的月光下》来源考 \ 296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版本考 \ 324

论吕骥的中国传统音乐分类法 \ 349

### 第四编 乐人研究与乐评

我所认识的蔡仲德先生 \ 361

走出大峡谷

——李西安的音乐人生 \ 365

樊祖荫教授学术之路管窥 \ 405

评中国少年民族乐团的理念与实践

——由“中国少年民族乐团建团十周年庆典”活动引发的思考 \ 424

“努力为中国民乐走出一条新路”

——“水样年华——老锣民乐作品音乐会”听后感 \ 431

反思历史论功过 重评往事话得失

——读居其宏新著《新中国音乐史》 \ 437

纵横经纬 建构批评

——对《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与《音乐批评学》的批评 \ 445

新世纪中华乐派：理念与路向

——“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侧记 \ 4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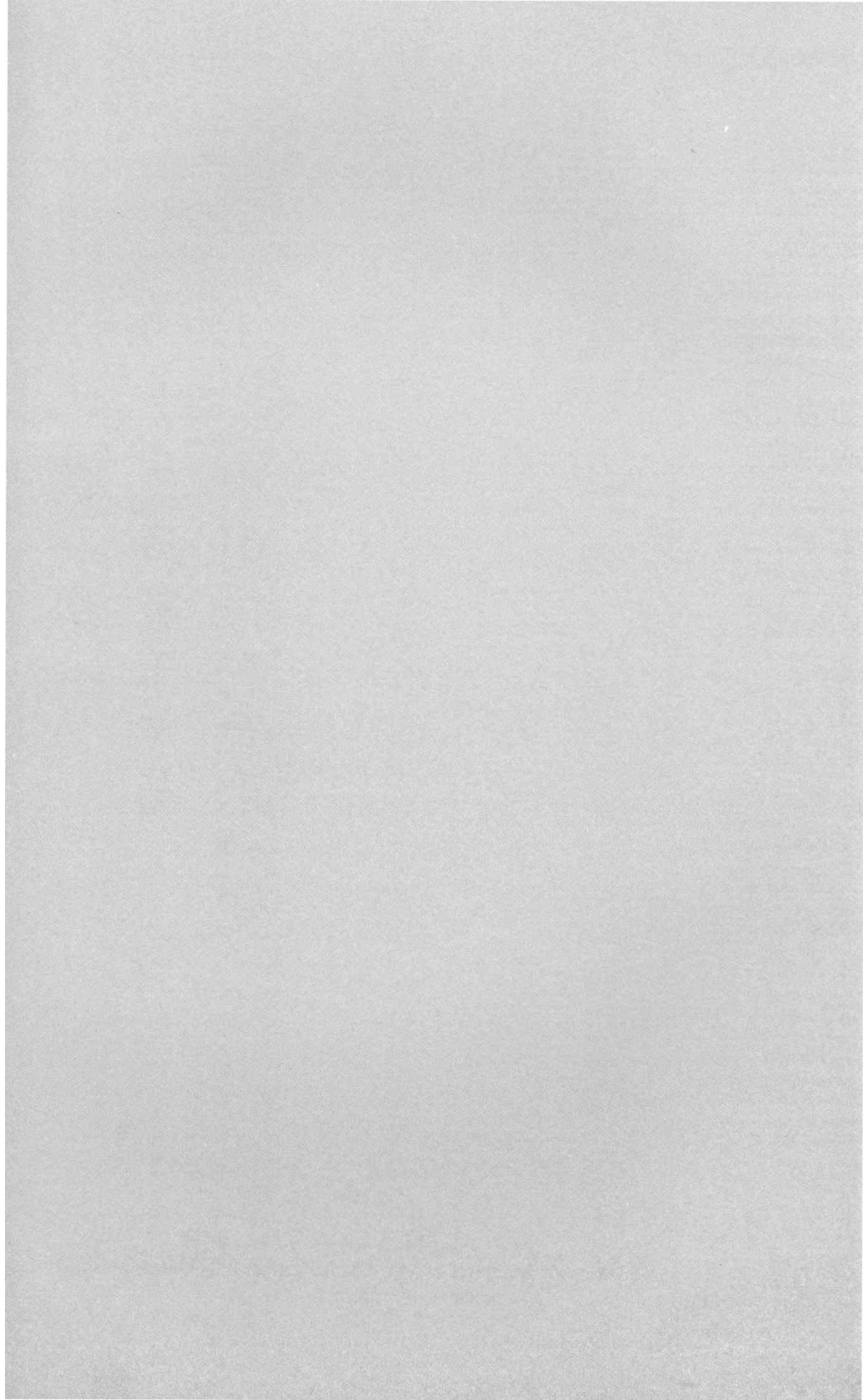
历史不会忘记他

——“刘雪庵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综述 \ 462

第一编

民族音乐学与

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 多元并存 交叉融合

——重审“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关系

## 一、缘起

本文所论之民族音乐学，为 Ethnomusicology 意义上的民族音乐学，即自1980年“南京会议”起正式进入中国的学科。这一外来学科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曾有多种译名，为行文方便，此处暂用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则是指在原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上发展更名的一门学科，有人将之称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或“中国传统音乐学”。称“研究”“理论”还是“学”可以商议，但只要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都应属于本学科的范畴。该学科虽根据研究对象（中国传统音乐）设定，但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自身的学术传统、研究特色，至少笔者是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看待的。这是本文进行讨论的前提。

三十余年来，关于本领域的学科讨论一直未有中断。与多数兄弟学科相比，国内民族音乐学一直在学科元理论上争论不停。主要议题有：

1. 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
2. 学科名称（或 Ethnomusicology 译名）应为民族音乐学还是音乐人类学，抑或其他；
3. 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去音乐化”问题；
4. 音乐与文化的“两张皮”问题；
5. 民族音乐学的发展趋向。

围绕以上议题，几代学者均有著述问世，亦不乏多个回合的论辩

交锋。Ethnomusicology 的学科定位问题在西方同样讨论得很热烈，但 Ethnomusicology 进入中国后还面临着如何对待中国固有学术传统及学科译名的问题，因而其整体情形较之西方更为复杂。笔者认为，以上论争中最激烈的是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关系问题，即二者究竟为同一个学科，还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其他学科定位方面的争议或多或少都与这一议题相关。该问题原本属于老生常谈的话题，但至今未得到解决。2010年，在中国传统音乐学会成立30周年的“南京会议”上，樊祖荫先生呼吁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有必要进行专题的讨论”<sup>①</sup>。杜亚雄先生在新版的《民族音乐学概论》中也认为：“直至目前，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人以往‘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的关系并没有真正解决。”<sup>②</sup>而强调二者的分野或对立，也是当前一种比较常见的看法。该问题仍有讨论的必要，是为本文“重审”之缘起。<sup>③</sup>

## 二、众说纷纭的学科关系

笔者认为，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学科关系，本质上属于“民族—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问题。前者是一个西学语境中的学科，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则有着自身的学术传统，二者相遇后产生了碰撞、吸纳和排斥。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王光祈至1980年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将之视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即可以把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整体纳入民族音乐学范畴；不将其看作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阶段，则证明二者是两个并列的不同学科。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为1980年的“南京会议”。

① 樊祖荫：《对中国传统音乐做整体性研究的思考》，《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② 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概论（修订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③ 洛秦先生2013年12月7日在致笔者的信中也认为：“其中学理误解、领域壁垒、专业藩篱、个人情感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混合在一起。因此，原本没有必要的问题也变得很有必要去分析、阐述和梳理二者的复杂关系了。”

### （一）“南京会议”的尴尬

从“南京会议”的实际情况来看，无论大会的组织者还是参与者，对民族音乐学的概念所指均有不同理解。会议的主要负责人高厚永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出身的学者，其此前曾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解到比较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但从1979年7月高先生向全国音乐界发布的会议函件中能够看出，他将“民族音乐学”大致等同为“民族音乐一学”：

为加强民族音乐理论的建设和发展，我们准备在今年下半年发起召开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座谈会”。

座谈会将着重回顾和讨论我们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经验，交流民族民间音乐、民族作曲技法等民族音乐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艺术实践和教学方面的经验，并对民族音乐学在我国今后的发展提出展望。<sup>①</sup>

1980年4月，以“南京艺术学院民族音乐学学术交流协作会议筹备组”名义发布的通知沿用了上述对民族音乐学的解释：“会议将着重回顾和讨论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历史，交流民族民间音乐、民族作曲技法等民族音乐学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艺术实践和教学方面的经验，并对民族音乐学在我国今后的发展提出展望。”<sup>②</sup>

在中文语境中，“民族音乐学”被很自然地理解为研究“民族音乐”之“学”，而未必有 Ethnomusicology 的含义。组委会的通知函件包含了这样的意味，多数与会者也是这样理解的。董维松先生曾回忆：“很多人认为‘民族音乐学’和‘民族音乐理论’是一回事，只是不同的叫法。”<sup>③</sup>绝大多数参会论文都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性质的论文<sup>④</sup>，袁静芳先生在是次会议的报道中也认为：“这次会议学术论文的突出特点，是民族音乐专业理论研究队伍中普遍地重视了对民族民间

<sup>①</sup> 转引自杜亚雄《召开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经过》，《音乐研究》2003年第4期。

<sup>②</sup> 转引自杜亚雄《召开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经过》，《音乐研究》2003年第4期。

<sup>③</sup> 董维松：《重提“民族音乐”及其学科名称问题》，《中国音乐》2008年第2期。

<sup>④</sup> 《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1980年第2期。

音乐旋律特性方面的探讨和研究。”<sup>①</sup>1980年6月21日，吕骥先生在闭幕式上的讲话代表了多数人对于“民族音乐学”的理解：“目前什么是民族音乐学，似乎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我想，只要是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都属于民族音乐学，都应当包括在内。”<sup>②</sup>

当时亦有将“民族音乐学”理解为“民族—音乐学”的观点。沈洽执笔、黄友葵宣读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提出：“民族音乐学，是音乐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又与人类学、人种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和美学等多种学科有着密切联系。”<sup>③</sup>但是如何看待此前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成果？其多数学术成果不一定具备 Ethnomusicology 的典型性质。对此，沈洽先生采用的处理方式是，以“民族—音乐学”为学科理解，将此前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视为有“特点”的“初创阶段”：

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我们国内目前还处在初创阶段。在我们这次会议召开之前，属于这个范围的工作，人们长期以来习惯地称之为“民族音乐理论”或“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而不称之为“民族音乐学”。这些工作，虽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属于“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也有着我国自己的特点，并且在学术上完全不逊于国际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水平，但是，就这门学科的完整意义来说，我们国内的研究现在还处在初创阶段。<sup>④</sup>

高厚永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民族—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结合。他一方面在文中介绍了西方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发展情况，认为“世界上也有人将它作为社会科学看待，认为研究音乐的社会背景已成为民族音乐学的重要部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系科专业，尚处

① 袁静芳：《记在南京召开的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② 吕骥：《在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1980年第2期。

③ 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1980年第2期。

④ 黄友葵：《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开幕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1980年第2期。

于初创阶段”。<sup>①</sup>与此同时，高先生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理解为“主要研究‘自我音乐’”<sup>②</sup>，“从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学的观点来说，它的研究内容，应当是以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音乐五大类为基础的”<sup>③</sup>。高先生的大会报告《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用很大篇幅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一学”）进行了总结，其将自萧友梅、童斐、刘天华至1980年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成果直接视为“民族音乐学”，认为“四十年代以延安鲁艺为主体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则是围绕以民歌为中心而展开的……对于如何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已经有较高的认识”；“中国设立民族音乐学系（即民族音乐理论系）是在六十年代”。<sup>④</sup>这里，高先生已将民族音乐理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直接视为民族音乐学了。

## （二）“南京会议”后的努力与困境

如果说“南京会议”上二者的关系问题还只是初现端倪，那么随后这一问题则向公开和纵深方向发展：一方面，“民族音乐一学”的理解仍在继续，如1982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民族学年会”<sup>⑤</sup>、“山东省第一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sup>⑥</sup>等。杨荫浏先生在怀念李元庆先生的文章中，也称其为“耕耘民族音乐学的好园丁”<sup>⑦</sup>。另一方面，赵如兰、俞人豪<sup>⑧</sup>、费师逊<sup>⑨</sup>、孙国荣<sup>⑩</sup>等或介绍、或摘译“民族一音乐学”意义上的 Ethnomusicology，如赵如兰先生强调：“‘民族音乐学’这个名词不是指定某一个区域，而是指定一种特别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说‘民族音乐学’中的‘民族’是近乎‘民族学’的定义。‘民族学’是着重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之中的文化背景，从这文化背景的了解再进一步观察它的音乐特

① 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音乐研究》1980年第4期。

② 高厚永：《召开“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的前前后后》，《中国音乐》2012年第1期。

③ 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音乐研究》1980年第4期。

④ 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和发展》，《音乐研究》1980年第4期。

⑤ 乐：《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次年会在北京举行》，《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

⑥ 凤良：《山东省第一届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简介》，《齐鲁艺苑》1982年第S1期。

⑦ 杨荫浏：《耕耘民族音乐学的好园丁——忆元庆同志》，《人民音乐》1982年第4期。

⑧ 俞人豪：《民族音乐学介绍》，《音乐研究》1981年第4期。

⑨ 费师逊：《关于民族音乐学的科研与教学问题》，《广州音乐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⑩ 孙国荣：《现代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1982年第4期。

征，才是民族音乐学。”<sup>①</sup>有学者明确指出，“把民族音乐理论和民族民间音乐研究改称为民族音乐学是‘用词不当’‘名不符实’”<sup>②</sup>。

1982年，中国音乐学院承办“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次年会”。鉴于与会人员多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方向的学者，而年会又必须打着“民族音乐学”的旗号，因而如何恰当地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成为承办方首要考虑的学术问题。董维松、沈洽在《民族音乐学问题》中认为，Ethnomusicology与民族音乐理论在重视研究对象的文化背景、文化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念、研究自我音乐等方面，有着共通之处；二者的学科特点、研究目的等方面尚存差异，但后者可以向前者学习，以便“把我们在传统的民族音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民族音乐学充分地发展起来”<sup>③</sup>。通过梳理二者的同异之处，将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调整为“中华民族的、至今活着的传统音乐”，将研究目标调整为“建立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为发展我们民族的新音乐和振兴中华服务”，该文将民族音乐学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统合起来。

尽管有多位学者的努力，尽管当时以民族音乐学为名的年会已召开多届，但关于二者的学科争论却愈演愈烈。赵沅先生公开质疑把民族音乐研究工作称之为民族音乐学“不太理想”。<sup>④</sup>杜亚雄先生撰文指出：“民族音乐学不等于研究民族音乐的学问”，“民族音乐学不等于民族民间音乐研究”。<sup>⑤</sup>因此学者们在当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学科名称，这些名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将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纳入民族音乐学范畴的一种回避或否定：

1. “音乐民族学”，以乔建中先生、金经言先生、《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等学者及著作为代表。1985年，乔建中与金经言先生建议将Ethnomusicology译为音乐民族学，“‘民族音乐’一词，似已有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概念，即指中国版图上的各种音乐。现在在其后缀以‘学’字，实为‘民族

① 赵如兰：《漫谈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1983年第3期。

② 董维松、沈洽：《民族音乐学问题》，《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

③ 董维松、沈洽：《民族音乐学问题》，《音乐研究》1982年第4期，该文由二人共同讨论，沈洽执笔，主要代表了沈洽当时的观点。

④ 赵沅：《在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沈阳片）上的开场白》，《音乐研究》1985年第1期。

⑤ 杜亚雄：《有关民族音乐学的几个问题》，《中国音乐》1986年第4期。